

# 从集体仪式到世俗聚会： 心理学视野下的集体欢腾及其社会心理效应<sup>\*</sup>

薛秋管健<sup>\*\*</sup>

(南开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心理学系, 天津, 300350)

**摘要** 集体欢腾最初来源于集体仪式, 现已成为一种普遍存在于世俗聚会中的“团结粘合剂”。从心理学角度出发, 世俗聚会集体欢腾与涂尔干宗教仪式集体欢腾相异。与宗教仪式集体欢腾相比, 世俗聚会集体欢腾的内涵、产生条件和研究方法已发生流变, 其具有促进群体凝聚力、心理健康等社会心理效应, 且该效应具有跨时间的持续性影响。未来研究需进一步关注集体欢腾的消极影响以及线下与线上集体欢腾的差异, 深化揭示集体欢腾效应的持续性影响机制。

**关键词** 集体欢腾 集体聚会 群体凝聚力 心理健康

集体欢腾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可以理解为个体与他人参与集体聚会时, 个人情绪会因为群体的共同体验而被放大和强化, 进而形成一种强烈的共享情绪。集体欢腾是在大型集体活动中, 如阅兵典礼、音乐会、体育比赛或民族节日上, 你可能会体验到的情绪同步化。有人把它描述为一个时刻, 可能是人群中的每个人聚在一起的时刻, 可能是观众在欣赏一些美妙音乐的时刻, 可能是中华民族在升国旗奏国歌的时刻, 亦可能是奥运会上运动员夺冠的时刻。这是一群甚至可能不认识彼此的人共同进行同样的事所带来的一种积极、愉快的情绪体验。

从远古时代开始, 人类便以部族、村落等方式群居, 除了与宗教相关联的集体仪式外, 还创造了许多世俗中集体参与的集体欢腾活动, 中国各民族的民间集体传统节日中, 常见集体欢腾现象。例如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彝族火把节, 被称为东方的“狂欢节”, 人人手持火把, 齐步奔走, 最后将手中火把聚在一起形成一堆巨大的篝火, 大家手拉手围着篝火在载歌载舞中集体狂欢。而景颇族的目瑙纵歌、傣族的泼水节等民族传统文化习俗亦是民间集体欢腾的体现。个人的情感会因群体的共同体验而被放大和强化, 进而形成强烈的集体情感, 收获一种与有荣焉的幸福感。

## 1 集体欢腾：社会学与心理学视野下的区分

### 1.1 内涵上的相异性

集体欢腾由涂尔干于 1912 年正式提出, 近 100 多年以来, 经 Páez、Gabriel 等人在涂尔干集体欢腾概念基础上的扩展, 引起了社会心理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随着时代的发展, 参与宗教仪式活动以及具有宗教信仰的人数正在下降 (Twenge et al., 2016)。现代人很难从原始的集体宗教仪式中体验集体欢腾, 也更难通过集体欢腾解决不同群体间的凝聚力。因此, 集体欢腾的内涵演变也随之经历了从集体仪式到世俗聚会的转变。起初, 在传统社会中人们把集体欢腾理解为一种神圣感, 其只有在具有象征意义的宗教仪式情境中被唤醒。如今, 在现代社会中集体欢腾已被世俗化, 即使在普遍的日常聚会中, 集体欢腾也常常发生。集体欢腾的概念具有两个意义上的流变, 第一为去神圣化 (即世俗化)、第二为去仪式化。

集体欢腾是个体在参与集体仪式活动时发生的个人情绪同步和强化的过程 (涂尔干, 1999)。涂尔干最初创造集体欢腾是为了描述集体宗教仪式活动产生的情感效果, 即原始人的日常生活是很平静的, 而在集体仪式中却很兴奋、冲动和情绪激昂, 并将其归为是“神”的力量所致。在传统社会背景下, 涂尔干过于强调宗教集体仪式, 认为集体欢腾仅存

<sup>\*</sup>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 (23JZD032) 的资助。

<sup>\*\*</sup> 通讯作者: 管健, E-mail: nkguanjian@aliyun.com

DOI:10.16719/j.cnki.1671-6981.20260215

在于集体仪式情境，唤醒集体欢腾要求人们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下，通过重复执行具有刻板性、象征性和强迫性的相同序列动作，使得自我与他人发生重叠，进而产生一种神圣感和自我超越感。在宗教集体仪式下，人们可以通过集体欢腾进入到神圣世界，可以感受到世俗生活中体验不到的神圣感和仪式感，其可以把神圣与世俗分开。

从变迁的角度看，宗教集体仪式主要流行于传统社会，而世俗聚会则主要流行于当下的现代社会。因此，世界范围内集体欢腾也经历了从宗教仪式到世俗聚会的变化：世俗聚会中的集体欢腾较为多见，宗教仪式下的集体欢腾不断式微。心理学研究者认为集体欢腾并不只存在于集体仪式中，在世俗聚会中也常常发生，其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例如，有研究发现在世俗聚会中有 3/4 的被试每周至少体验 1 次集体欢腾，1/3 的被试每天都经历 1 次集体欢腾（Gabriel et al., 2020）。集体欢腾的核心要素除了神圣感外，还包括了日常生活中与他人普遍的联结感（Gabriel et al., 2017）和团结感（Páez et al., 2015; Wlodarczyk et al., 2023）。世俗聚会中的集体欢腾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较少，不需要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在音乐会、电影院、广场舞等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在现代社会背景下，世俗聚会情境中的集体欢腾具有世俗化、去仪式化特征，其并不是把神圣和世俗分开，而是把日常的世俗变得有意义和神圣（Gabriel et al., 2020）。

此外，涂尔干（1999）认为集体欢腾与所涉及的情绪类型无关，不管任何情绪，关键在于被分享。但有学者认为集体欢腾除了需要被分享之外，更重要的是不同类型的情绪成分的融合和情绪同步。Rimé 和 Páez（2023）提出，集体欢腾是指集体聚会的参与者之间因共享情绪而表现出明显的情绪高涨状态，其既涉及常规情绪（如喜悦、悲伤），也涉及更复杂的情绪状态（如敬畏、集体自豪感），并强调这些不同类型的情绪成分的融合，以产生情绪的同步化，从而达到高唤醒水平的集体欢腾。

## 1.2 产生条件上的相异性

集体聚会期间的情绪体验受到各种变量的影响，其中一些变量是激活集体欢腾不可或缺的标准（Collins, 2014）。通过分析，我们发现相较于集体仪式集体欢腾，世俗聚会集体欢腾产生的先决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已发生改变。当前集体欢腾激活要素从认知、情感和行为角度可以分别归纳为共享注意

力、共享情绪和动作协调。

涂尔干（1999）早期提出，集体欢腾的产生条件有二：其一是注意力集中，即参与者需要有共同的注意力焦点；其二是情绪和行为表达的不同步，即参与者在动作、手势等方面的同步。他认为一个群体同步他们的集体行为和注意力之后，将促进彼此的情绪同步，共享的情绪状态因个体间的相互强化而变得更加强烈。

随后，Wlodarczyk、Pizarro 等人在涂尔干的基础上，发展了集体欢腾新的产生要素。Wlodarczyk 等人（2020）认为集体聚会中集体欢腾的唤醒需要满足三个先决条件，一是人们聚集同一个场所，并意识到彼此间的共同存在与互动（Collins, 2004），原因是高人群密度会强化和预测集体欢腾（Liebst et al., 2019）；二是注意力同步，即有共同关注的焦点（Rennung & Göritz, 2016）；三是在特定的集体聚会中个体间的有意协调（Gabriel et al., 2017; Rennung & Göritz, 2016）。以上三个条件促进了集体欢腾的出现。

此外，Pizarro 等人（2022）认为集体欢腾的激活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其一，群体成员间的注意力同步；其二，群体成员间在行为层面趋于一致；其三，最重要的是群体成员间共享情绪。这三个条件的满足有助于个体的情绪体验得到强化并产生认知上的变化，群体意识战胜个人意识，从而唤醒集体欢腾。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集体欢腾被激活的核心要素在认知、情感和行为层面已发生改变。从认知和情感角度出发，不管是从注意力集中到共享注意力，还是从情绪同步到共享情绪，参与者在认知和情感上发生了从个人到群体的转变，强调注意力和情绪并不仅是个人层面的体验，而是通过共享被整个群体所感知，群体成员间需要达到一种集体层面的共享状态。另外，从行为角度看，动作同步已演变为动作协调，这暗示集体欢腾的激活情景并不仅限于集体仪式，其普遍存在于世俗的集体聚会中。涂尔干认为动作同步是集体仪式中激活集体欢腾的必要条件。集体仪式中的动作同步是重复执行严格规定的相同序列动作，具有刻板性、强迫性和象征性（薛秋，尹可丽，2023），而动作协调不具有以上特征，强调人际互动性，参与者的动作不再是伴随仪式化的序列动作。

## 1.3 研究方法上的相异性

### 1.3.1 集体欢腾的传统研究方法

早期学者运用社会学研究方法对集体欢腾进行探索,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多变和环境的不可控性,很难采取纯粹的实验方法。因此,社会学家只能比较两个较为相似的社会事实,将两者间的共性作为控制变量,将异性做比较,从而得出变量之间的关系。涂尔干主要采用比较历史研究方法,即把两个以上的民族进行对照研究。例如,涂尔干(1999)选取的研究对象来源于两个原始部落——澳洲的土著和美洲的印第安人,通过对这两个部落的比较研究发现集体欢腾起源于集体宗教仪式,其可以将世俗世界和神圣世界区分。首先,涂尔干虽然做出了严谨的逻辑推理和论证,但集体欢腾的研究材料均来自于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的二手文献,缺乏经验事实的支撑。其次,该种研究方法适用于分析宏观社会趋势以及大规模群体层面的社会现象,但对微观层面的个体行为和动机缺乏深度分析。再次,这种方法会产生主观性偏差,对于集体欢腾同一社会现象,不同评价者可能因个人经验、立场、价值观等因素的不同而导致结果差异较大。最后,该方法的研究结果是无法被检验的,因为其未设定统一且量化的客观标准,不同评价者可能采用不同参照,导致结果缺乏可重复性。

### 1.3.2 集体欢腾的新近研究方法

社会心理学者将集体欢腾可操作化,编制了集体欢腾量表,使集体欢腾以量化的方法进行评估和预测。例如, Gabriel 等人(2020)编制了集体欢腾量表; Páez 等人(2015)将感知情感同步(perceived emotional synchrony)作为集体欢腾的测量指标,编制了感知情感同步量表。因此,将集体欢腾和感知情感同步进行互换使用(Castro-Abril et al., 2021; Włodarczyk et al., 2023; Zabala et al., 2023)。Włodarczyk 等人(2020)对 Páez 等人的量表做出修订,提出简化版的感知情感同步量表。

另外,目前有关集体欢腾的心理学实证研究中,在实验条件下诱发集体欢腾的方法有两种。其一是通过向被试解释集体欢腾,然后让其回忆一件集体欢腾的事件并花2分钟沉浸在集体欢腾体验中;随后,被试需列出与该事件相关的4个关键词,并用3分钟描写该事件;最后对集体欢腾进行操作性检验(Naidu et al., 2024)。其中存在一些问题,如被试是否能够精准回忆过去;即使能够回忆过去,是否会如实报告;即使能够回忆并如实报告,选择、重构等记忆偏差会对结果造成影响,甚至最后对被

试的回忆内容进行人工编码也可能出现偏差,最终减低结果的可靠性。其二是把各种真实集体聚会环境中的参与者作为研究对象并用量表测量,在运动节(Páez et al., 2015)、爱国游行(Włodarczyk et al., 2023)、节日庆典(Włodarczyk et al., 2020)、三八节(Zumeta et al., 2020)等现实生活集体聚会背景下有利于诱发集体欢腾高唤醒水平。采用自我报告的方法具有局限性,在集体聚会背景下,由于社会赞许效应,参与者的去个性化可能会导致规范性作答,结合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可能有利于减少自我报告产生的偏差。

一方面,部分研究者采用随机组设计,将被试随机分配到实验组和控制组。实验组的被试要求参与集体聚会或者描述集体欢腾事件以唤醒集体欢腾,而控制组被试参与无关群众事件/不参与集体聚会或者描述无关事件即可(Castro-Abril et al., 2021; Naidu et al., 2024),最后对两组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例如, Gabriel 等人(2024)让实验组被试描述群体活跃的集体聚会事件,控制组则描述群体沉默的事件。结果发现,与控制组相比,集体欢腾组的生命意义感和幸福感得到显著提升。该研究方法简单易行,通过随机分配原则减少不同组间的基线特征差异,能够较好地平衡组间差异,提高了研究的可比性和可靠性。但是由于接受处理的总是不同的个体,从根本上是不能排除个体差异对实验结果的混淆的;其次,人为控制的环境可能无法完全模拟真实生活,结果的可推广性受限;最后,虽然能够揭示因果关系,但无法对未来趋势进行动态预测。

另一方面,大部分研究者倾向于使用时间序列设计,通过按照一定的时间间隔(天、周、月等)对同一批样本分别实施几次横断研究,以比较相关的集体欢腾数据在测量时间上的差异。例如, Bouchat 等人(2020)在一个高度生态环境中探讨集体欢腾的短期和长期社会心理影响,对参与大规模童子军聚会的参与者分别在三个时间点采集集体欢腾等相关数据:T1(大型童子军聚会前1~9天)、T2(参与聚会后24h内)和T3(聚会后10周);结果表明,在集体聚会期间,参与者集体欢腾唤醒水平越高,其群体内认同、身份融合和自尊越强,且与非参与者相比,参与者在10周后表现出更高水平的群体内认同、身份融合和自尊。首先,每次测量的都是同一批样本,因此能够避免因不同时间点调查样本不一样而不可比的问题;其次,基于一定

的研究假设,可以对年龄效应、时间效应进行分解,从而考察集体欢腾的不同效应。不过,一是该设计的数据采集相对来说比较困难,常因为人口流动、失联等因素导致样本流失的问题;二是虽然在分析时间序列数据具有一定优势,但仍然很难完全确定因果关系,比如说无法排除社会变迁等其他变量对结果的影响;三是对有限的样本进行施测,结果可靠性受样本大小和代表性影响较大。

此外,极少数研究采用的设计与横断序列设计类似,即分别在不同的时间点对不同批次被试进行2次相同测量的研究,并比较2项研究的集体欢腾及相关数据的差异。例如,Zlobina和Dávila(2022)在研究1中对集体欢腾当天的参与者进行在线研究,时隔聚会8个月后对另一群集体聚会参与者进行第2次研究,旨在测试第1次研究中集体欢腾产生影响的持久性,两次研究的测量方法相同。就该研究设计而言,首先,在时间间隔8个月的两项研究中对同一假设模型进行重复验证,有利于提高结论的稳健性和外部效度;其次,不同时间点上样本可以不一样,因此获取数据相对容易;再次,能够研究一切可通过问卷调查测量的心理与行为,适用范围广;最后,根据研究假设,可对年龄效应、时间效应进行分解(Yang & Land, 2008)。但是,在不同时间点对不同研究样本进行施测,样本是否具有代表性、样本间是否具有可比较性并不能保证,以致于结果的可推广性以及可靠性受限,并不能合理预测集体欢腾的影响具有跨时间的持久性。

## 2 心理学视野下集体欢腾的社会心理效应及其解释机制

当前大量心理学实证研究表明,集体欢腾能够引发一系列的社会心理效应(Páez et al., 2015)。例如,集体欢腾增强集体认同(Bouchat et al., 2020)、社会凝聚力(Pelletier, 2018)、自我超越的情绪(Zumeta et al., 2020)、亲社会信念(Włodarczyk et al., 2020)等。基于涂尔干的集体欢腾理论,研究者发展了新的理论对集体欢腾的社会心理效应进行了解释和研究,发现集体欢腾能够在增强凝聚力、促进心理健康等方面发挥对个体和群体的心理保护作用以及产生一种跨时间的持久性影响。

### 2.1 集体欢腾增强群体凝聚力及其认知机制

集体欢腾巩固并加强了个体间的联结,其是一

个产生社会团结的过程(Dimond et al., 2015)。集体聚会可以增强社会凝聚力和道德教化,并重新达成统一的价值观(Rimé et al., 2020),而该结果可以归结于集体欢腾在其中的影响机制。有研究发现集体欢腾有助于增强集体自尊以及集体信念、促进社会凝聚力(Włodarczyk et al., 2023)。即使在群体凝聚力减弱的情境下,集体欢腾也能够重塑个体间的凝聚力(Pelletier, 2018)。此外,集体欢腾体验有助于塑造个体的道德责任感,增强感知社会规范,进而表现出更多的预防性行为(Zlobina & Dávila, 2022)。

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集体欢腾促进群体凝聚力做出了理论解释。当前研究者主要关注身份融合机制,即集体欢腾状态有助于促进参与者产生身份融合,进一步增强群体凝聚力。Páez等人(2015)发现集体欢腾可以产生身份融合,自我概念发生了从个人到集体水平的变化。社会身份的转变使个体不再将自己视为一个单独的个体,而是集体的组成部分(Neville & Reicher, 2011)。近期多项研究表明,不管在任何类型的集体聚会(如民俗节日、庆祝仪式)中,集体欢腾均可以激活身份融合(Bouchat et al., 2020; Zabala et al., 2024; Zumeta et al., 2020),进而促进社会联结(Swann et al., 2012)。总之,从社会身份角度,身份融合解释了集体欢腾对群体凝聚力的促进作用。

进一步的研究解释了集体欢腾促进群体凝聚力的认知基础。在集体欢腾状态下,被试对所在群体的社会认同增强,从而促进群体凝聚力。新涂尔干集体过程模型(Neo-Durkheimian model of collective processes)强调在群体活动中个体间的注意力、动作、情感等多方面的同步体验有助于增强集体欢腾,高唤醒集体欢腾加强了凝聚力,社会认同在其中起着推动作用(Páez et al., 2015; Włodarczyk et al., 2023)。从社会认同的视角来看,其一,集体聚会经历可以导致认知上的转变,即把自我视为共同类别的成员,个体倾向按照群体的规范和价值观来解释经验和采取行动,从而改变自我概念、信念和行为;其二,共同社会身份的感知会导致关系的转变,根据共同类别看待自己的个体往往会变得更加信任、尊重他人以及互相合作;最后,在认知和关系上的转变让个人体验到强烈的积极情绪,进而唤醒集体欢腾(Hopkins et al., 2016)。相关实证研究强调集体聚会中的集体欢腾有助于形成高度的社会认同,特别是个人与集

体自我的重叠 (Włodarczyk et al., 2020)。

## 2.2 集体欢腾促进心理健康及其情绪机制

以往研究表明,集体参与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来源 (Hopkins et al., 2016; Kettner et al., 2021)。集体欢腾有益于理解世俗集体聚会如何赋予人类生活意义,共同经历集体欢腾提升了个体的幸福感 (Gabriel et al., 2020) 和自我效能感 (Zumeta et al., 2016)。Bouchat 等人 (2024) 对 13 篇涉及集体欢腾文献进行元分析发现,集体欢腾是增强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降低孤独感的主要因素。Naidu 等人 (2024) 通过实验研究也发现集体欢腾对心理健康的促进作用。情绪理论 (affective theory) 提出,人们聚集在一起并在动作上进行高度同步时,密切协调地动作向感知者暗示了某种程度上的积极情绪,产生了积极的情绪效果,其可以归结于集体欢腾的作用 (Marsh et al., 2009)。蜂巢假说 (hive hypothesis) 也支持参与集体同步活动易于激发集体欢腾,当人们融入一个集体时会产生幸福,原因可能是从蜂巢式活动中获得强烈的快乐 (Haidt et al., 2010)。

此外,即使在消极的集体聚会中,集体欢腾也可以增加积极情绪。研究表明,消极集体聚会情境中的集体欢腾预测了更高水平的幸福感 (Włodarczyk et al., 2020)。在消极的集体聚会背景下,被试的愤怒、痛苦等消极情绪被诱发,从而激发了集体欢腾,使得被试的积极情绪上升,而消极情绪并无变化 (Pizarro et al., 2022)。这说明集体欢腾具有将消极情绪转化为积极情绪的作用。集体欢腾不是一种特定的情感,它不仅对正面情绪产生影响,其也可能是负面情绪的结果,如葬礼仪式上常见的痛苦和悲痛。关键在于创造积极的情绪氛围,将悲伤、恐惧转化为希望、信任;集体仪式通过集体欢腾增强情感,特别是积极的集体情感 (如敬畏、道德激励和希望),这解释了集体聚会如何增加幸福感 (Collins, 2004)。总之,无论集体聚会的情感内容和形式如何 (如欢乐的生日宴会、悲伤的葬礼或爱国仪式),集体欢腾会唤起与他人的联结,并激发对群体的道德承诺 (Cusi et al., 2019; Pizarro et al., 2019)。

另外,集体欢腾有利于激发自我超越情感 (self-transcendent emotions),其包括了希望、卓越、同情、感激、灵感和敬畏。在一场大规模的三八妇女节示威游行中发现,与对照组相比,参与集体聚会激发了集体欢腾,从而促进自我超越情感和价值观的统一,且在女性群体中的影响更为明显

(Zumeta et al., 2020)。后来 Włodarczyk 等人 (2023) 也发现集体欢腾能够增加自我超越情感的相同结论。自我超越情感的特点是自我专注度降低、个人与集体的界限模糊以及自我与他人联系增强,并促进个体与社会群体的团结 (Stellar et al., 2017; Van Cappellen, 2014)。且自我超越情感伴随着积极的行为倾向,例如亲社会行为和趋向行为 (Zickfeld et al., 2019)。因此,其削弱了自我与社会之间的差异,增加了人们与周围人或社会建设的接纳和联结,从而促进自我超越。

## 2.3 集体欢腾积极效应的持久性

当前关于集体欢腾促进群体凝聚力、心理健康等积极效应的实证研究较多,但对集体欢腾积极效应的可持续性知之甚少。涂尔干 (1999) 认为宗教要求每周至少参与一次集体仪式的原因在于集体欢腾的社会心理影响是相当短暂的。然而,本文通过整理文献发现,集体欢腾的社会心理效应并非仅限于短期影响,其具有跨时间的持续性。即便在实验情境中诱发被试的集体欢腾作用结束后,其仍然受益于集体欢腾效应。集体欢腾具有把人们聚集在一起、使群体成员间的联结更为紧密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在于集体欢腾效应的持久性,其是维持积极社会心理效应的关键。另外,集体欢腾效应的持久性影响在社会凝聚力、心理健康上具有差异性。

在涂尔干看来,参与集体聚会带来的积极效应是短期的,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因此他强调有必要重复参与集体仪式。新涂尔干集体过程模型认为参与聚会引发的集体欢腾在社会心理效应中起着核心作用,集体欢腾效应具有潜在的长期影响 (Páez et al., 2015)。已有的研究表明,集体欢腾的积极影响少则可以持续 1 至 4 周 (Khan et al., 2016; Páez et al., 2015),多则长达 10 周 (Bouchat et al., 2020),甚至是 8 个月 (Zlobina & Dávila, 2022)。

参与集体聚会后在心理社会层面产生了一系列积极影响,且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持久性。Zabala 等人 (2023) 通过一项纵向研究发现,集体欢腾对社会融合、社会接纳的促进作用在实验结束后通过集体欢腾至少可以维持 6 至 7 周,且提升了日后的归属感和社区接纳感。基于新涂尔干集体过程模型,学者通过一项纵向研究发现,集体欢腾正向预测群体内认同、身份融合、自豪感、积极情感和价值观。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积极效果在参与聚会结束后通过集体欢腾持续了 10 周。这项研究首次表明集体欢

腾促进了群体成员间的群体认同、身份融合、自豪感、自尊和幸福感，并且这些积极的影响可以长达 10 周以上（Bouchat et al., 2020）。

然而，集体欢腾的持久效应在社会规范中并未发挥作用，而在心理健康方面对个体产生的影响更为持久，这可能与社会文化背景有关。研究表明，参与集体鼓掌活动有助于唤醒集体欢腾，进而增强道德责任感和社会规范，8 个月后，集体欢腾对道德责任感仍具有影响，而对感知社会规范的影响不再存在（Zlobina & Dávila, 2022）。集体欢腾对社会规范的影响效果可能因社会文化环境的不同而不同，其中会受到文化价值观的制约，如集体主义和文化紧密性，这些价值观加强了对行为的规范作用（Fischer & Karl, 2020）。

#### 2.4 集体欢腾的心理学实证研究小结

从前文提到集体欢腾的积极效应及其解释机制可以反映出，集体欢腾积极效应具有多维度性特征。基于已有的心理学实证研究，本研究从认知维度、情感维度、时间维度三个方面探讨了集体欢腾的社会心理学效应的多维度性。

首先，有研究表明，集体欢腾不仅具有促进身份融合、社会认同的作用，还可以增强集体自尊、集体信念和凝聚力（Páez et al., 2015; Włodarczyk et al., 2023）。在集体欢腾中，个体更加认同自己所属的群体，个人与集体自我发生重叠，进而感受到更强的群体凝聚力。集体欢腾在社会认同、群体凝聚力等方面的积极效应可以归纳为认知维度。

其次，集体欢腾往往伴随着强烈的情感体验，如兴奋、激动、自豪等。这些情感在集体中相互传递和放大并形成强烈的情感共鸣，进而共同经历集体欢腾在增强幸福感（Gabriel et al., 2020）和自我效能感（Zumeta et al., 2016）、降低孤独感（Bouchat et al., 2024）方面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集体欢腾在心理健康方面的积极影响可以归纳为情感维度。

最后，集体欢腾在群体凝聚力、心理健康等方面的积极心理效应在时间上具有持久性，其不仅在世俗的集体聚会期间存在，而且聚会结束后仍然持续在个体之间传递和延续。研究表明，集体欢腾的积极影响少则可以持续 1~4 周（Khan et al., 2016; Páez et al., 2015），多则长达 8 个月（Zlobina & Dávila, 2022）。集体欢腾作为一种跨时间的持久现象，不仅在集体聚会期间产生强烈的影响，而且在聚会结束后仍然通过情感渲染、集体记忆持续存在。例如，

春节集体欢腾活动在每年的重复中不断强化其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使得集体欢腾成为一种集体记忆，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价值观和集体参与行为。

表 1 列举了集体欢腾的一些代表性心理学实证研究，总结了这些研究的实验设计、所解决的问题及其相应的理论解释。从实验设计来看，目前集体欢腾的实验研究多采用纵向研究设计，提高了研究的生态学效度。从解释或理论来看，当前研究侧重于从社会认知的角度解释集体欢腾对群体凝聚力的促进作用，从社会情感角度探讨集体欢腾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新涂尔干集体过程模型被广泛用于解释集体欢腾的心理效应。

### 3 问题与展望

综上所述，集体欢腾的流变及其社会心理效应加深了我们对集体欢腾现象的理解，但该领域还有几个问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 3.1 探究集体欢腾的消极影响

涂尔干强调集体欢腾包括暴力、无节制、不受约束成分，其会导致反规范行为。王斌（2015）也认为，集体欢腾具有整合性和狂暴性特征。集体欢腾既是维系道德和秩序所必不可少的纽带，又是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诱因。然而，当前集中于集体欢腾的积极效应，少有实证研究探讨集体欢腾的负面影响。

在涂尔干时代，人们往往把集体欢腾与极端行为联系起来。集体欢腾状态会导致个体失去自我意识和推断能力，因而易出现反社会的极端行为（Moscovici, 1993）。该观点得到去个性化理论的支持，即在集体情境中的匿名、大规模的群体和自我意识降低等因素会导致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Diener, 1979）。然而，社会认同模型指出，去个性化会促进亲社会行为，防止社会动乱，并有助于防止儿童偏见的发展（Vilanova, 2017）。此外，社会心理学研究也表明，集体欢腾过程中的群体行为并非是不受限制的，即使在自我意识降低的情况下，个体是受所在群体的社会认同感支配并根据群体规范行事（Drury et al., 2020; Stott et al., 2018）。由此看来，当代的研究证据与传统社会的群体行为表现相违背。另外，100 多年前的集体欢腾文献资料与当今研究资料存在差异。前人在探讨集体欢腾现象时完全依赖于宗教集体仪式；相比之下，今天的体育比赛、音乐活动等世俗集体欢腾活动随处可见。虽然在大

表 1 集体欢腾的积极社会心理效应的部分代表性研究列举

分类	首作(年份)	解决问题	研究设计	解释或理论
集体欢腾 增强群体 凝聚力	Páez(2015)	集体欢腾→社会融合、身份融合	集体欢腾组(参与运动节集体聚会)/对照组(参与无关群众聚会)	身份融合机制:集体欢腾状态有助于促进参与者产生身份融合,进一步增强凝聚力。新涂尔干集体过程模型:强调群体注意力、动作、情感等多方面的同步体验有助于增强集体欢腾,进而加强凝聚力,社会认同在其中起着推动作用。
	Włodarczyk(2023)	集体欢腾→社会认同、身份融合、共同信念	前测(爱国游行聚会前4天);中测(参与聚会当天);后测(聚会后4天)	
	Włodarczyk(2020)	集体欢腾→社会认同	前测(节日庆典聚会前4天);中测(参与聚会当天);后测(聚会后4天)	
集体欢腾 促进心理 健康	Gabriel(2020)	集体欢腾→生活意义感、幸福感	集体欢腾组(描述群体活跃的集体聚会事件)/控制组(描述群体沉默的集体聚会事件)	情绪理论:集体活动中的密切协调动作向感知者暗示了某种程度上的积极情绪,该情绪效果是基于集体欢腾产生的。集体聚会中群体通过同步动作唤醒集体欢腾,从而促进心理健康。
	Naidu(2024)	集体欢腾→心理健康	集体欢腾组(描写集体欢腾事件)/控制组(描写普通事件)	
	Zumeta(2020)	集体欢腾→自我超越情感	集体欢腾组(参与三八节聚会活动)/控制组(关注三八节聚会活动)	
集体欢腾 积极效应 的持久性	Zabala(2023)	集体欢腾→社会融合、社会接纳、社会实现	纵向研究: T1(体育节聚会前3周)、T2(参与聚会后1周内)和T3(聚会后6-7周)	新涂尔干集体过程模型:参与聚会引发的集体欢腾在社会心理效应中起着核心作用,集体欢腾的积极心理效应在时间上具有潜在的长期持续性影响。
	Bouchat(2020)	集体欢腾→群体认同、身份融合、自尊、幸福感	纵向研究: T1(大型童子军聚会前1-9天)、T2(参与聚会后24h内)和T3(聚会后10周)	
	Bouchat(2024)	集体欢腾→自尊、积极情绪	纵向研究: T1(集体聚会前)、T2(参与聚会后24小时内)和T3(聚会后10周)	
	Zlobina(2022)	集体欢腾→道德责任感、社会规范	横向重复研究:研究1(参与聚会当天)、研究2(参与聚会后8个月)	

规模的集体事件中可能偶尔会出现极端的表现,但绝大多数的集体聚会未发生暴力和破坏性行为。鉴于集体欢腾的复杂性,在未来的研究中,学者可以对集体欢腾的负面影响给予更多的关注。

### 3.2 探索线上集体欢腾现象

随着社会的发展,集体欢腾的参与形式已发生变化。在互联网社会,网民参与的互联网集体行动日渐增多,集体欢腾也从线下转移到线上。线上集体欢腾随处可见,如热播的电视剧、热搜榜事件等引发网民狂热的转发、跟贴和评论。又如追星粉丝聚集在一起自发形成的文娱社群——“饭圈”热潮。一方面,她们因共同的偶像参与线上获奖庆祝活动、组织线上应援活动,这些集体行动和互动能够放大和强化粉丝群体成员间的情感联系,形成一种强烈的集体情绪共鸣,从而增强粉丝间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另一方面,线上集体欢腾也具有潜在的负面影响,饭圈文化中引起的集体欢腾过度狂热也会导致不理智的行为,如网络暴力、人肉搜索等。

线上集体欢腾可能具有双重影响,既要充分发

挥它的凝聚力功能,又要预防其可能带来的网络社会秩序乱象。集体欢腾的参与形式从以往的线下转变为线上,这两者之间的性质及其产生的影响有何异同?未来研究需从社会心理学视角,探索线上集体欢腾现象,进一步揭示线上集体欢腾的积极与消极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比较线下与线上集体欢腾的差异。

### 3.3 揭示集体欢腾效应的持久性

前文提到,集体欢腾在群体凝聚力、心理健康方面的积极社会心理效应具有跨时间的持续性,但集体欢腾效应的持久性影响并非对所有的研究变量都有效。例如,集体欢腾对群体内认同、身份融合和幸福感的促进作用可以维持至少10周(Bouchat et al., 2020)。但在感知社会规范上并未产生持续性影响(Zlobina & Dávila, 2022)。集体欢腾对社会规范的影响效果可能因社会文化环境的不同而不同,其中会受到文化价值观的制约(Fischer & Karl, 2020)。未来研究可以关注中国本土化的集体欢腾现象对社会规定的影响。

另外，集体欢腾的社会心理效应在时间维度上可能通过集体记忆机制产生持续性影响。情绪可以构建集体记忆，从而塑造社会身份（Pace & Bilgic, 2018）。不同的情绪能够通过强化集体记忆发挥各自特定的社会功能（Beristáin et al., 2000）。这提示集体欢腾作为一种积极的集体情绪，可能通过强化集体记忆在时间上产生持续的积极效应。例如在“五四运动”纪念活动中，集体欢腾通过升旗仪式、历史影像等文化符号激活并强化青年的爱国记忆、传承集体记忆，能够持续增强青年群体内部的凝聚力。未来研究需进一步揭示集体欢腾效应的持久性影响背后的解释机制。

### 3.4 厘清心理学视野下集体欢腾理论的局限性

集体欢腾理论是在 100 多年前的传统社会背景下，涂尔干通过对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的二手资料进行推理和论证后提出的，其并不能对现代世俗聚会中的集体欢腾现象进行合理的解释。首先，前文提到涂尔干认为集体欢腾是用来描述宗教仪式所产生的情感效果，并仅存在于集体仪式。集体欢腾在伴随重复刻板的仪式化和象征性的序列动作过程中产生，使其具有神圣化和仪式感特征。但有研究发现，集体欢腾普遍出现于世俗聚会，其是日常生活中的基本组成部分（Gabriel et al., 2020）。这说明集体欢腾理论过度强调宗教仪式下的神圣世界，而忽略了世俗世界中集体欢腾的普遍性和世俗性，因而无法从根本上解释普遍存在于世俗聚会中的集体欢腾现象。

另外，前文提到，集体欢腾促进群体凝聚力、心理健康等积极效应具有跨时间的持久性。但集体欢腾理论强调集体欢腾对心理和行为产生的影响是极其短暂的，其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因此个体需要每周定时重复参与宗教仪式。此外，涂尔干认为集体欢腾会因其狂暴性特征而引发反社会的破坏性行为，但目前对集体欢腾的描述以及产生的结果影响都是正面性的，而对于集体欢腾的负面影响并无实证研究的支持。这些遗留的问题都说明了集体欢腾理论在集体欢腾及其社会心理效应的解释力上仍有局限。

## 4 结语

总体而言，从变迁的角度看，世界范围内集体欢腾经历了从宗教仪式到世俗聚会的变化：世俗聚会中的集体欢腾较为多见，宗教仪式下的集体欢腾

不断式微。心理学视野下，世俗聚会集体欢腾在内涵、产生条件、研究方法上与涂尔干宗教仪式集体欢腾相异，且现代人从世俗聚会中能够体验到集体欢腾促进群体凝聚力、心理健康等积极社会心理效应及该效应跨时间的持久性影响。这也反过来解释了集体欢腾现象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普遍性和保留性。本文探究集体欢腾及其社会心理效应的理论机制，不仅有利于理解人类社会自身文明的发展与进程，更是将传统文化创新性转化使之得以继续维护个体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课题。

### 参考文献

- 爱弥尔·涂尔干. (1999).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渠东, 汲喆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 王斌. (2015). 线上集体欢腾：理解青年网民集体行动的新视角. *中国青年研究*, 10(10), 82-87.
- 薛秋, 尹可丽. (2023). 集体仪式的替代品：世俗中的同步动作及其机制. *心理科学进展*, 31(7), 1303-1317.
- Beristáin, C. M., Páez, D., & González, J. L., (2000). Rituals, social sharing, silence, emotions and collective memory claims in the case of the Guatemalan genocide. *Psicothema*, 12(1), 117-130.
- Bouchat, P., Pizarro, J. J., Páez, D., Zumeta, L., Basabe, N., Włodarczyk, A., Hatibovic, F., & Rimé, B. (2024). Contributions of group identification and emotional synchrony in understanding collective gatherings: A meta-analysis of 13 studies. *Group Processes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27(8), 1931-1959.
- Bouchat, P., Rimé, B., Van Eycken, R., & Nils, F. (2020). The virtues of collective gatherings: A study on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a major scouting event.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50(3), 189-201.
- Castro-Abril, P., Da Costa, S., Navarro-Carrillo, G., Caicedo-Moreno, A., Gracia-Leiva, M., Bouchat, P., Begoña, C., Lander, M., & Paez, D. (2021). Social Identity, perceived emotional synchrony, creativity, social representations, and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movements: The case of the 2019 Chilean populist protest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2, 764434.
- Collins, R. (2004).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ollins, R. (2014).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and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In von Scheve C., Salmela M. (Eds.), *Collective emotions: Perspectives from psychology,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pp. 299-31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usi, O., Pizarro, J. J., Alfaro, L., Vera Calzaretta, A., Burboa, A., Carrera, P., & Páez, D. (2019). Elevación o Inspiración Moral: Creación y Validación de una Escala de Elevación en Castellano [Moral elevation or inspiration: Creation and validation of an elevation scale in Spanish]. *Avances En Psicología Latinoamericana*, 4, 38-56.
- Diener, E. (1979). Deindividuation, self-awareness, and disinhibi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7(7), 1160-1171.
- Dimond, R., Bartlett, A., & Lewis, J. (2015). What binds biosociality? The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of the parent-led conference. *Social Science and*

- Medicine*, 126, 1–8.
- Drury, J., Stott, C., Ball, R., Reicher, S., Neville, F., Bell, L., Biddlestone, M., Choudhury, S., & Ryan, C. (2020). A 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riot diffusion: From injustice to empowerment in the 2011 London riot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0(3), 646–661.
- Fischer, R., & Karl, J. A. (2020). Predicting behavioral intentions to prevent or mitigate COVID-19: A cross-cultural meta-analysis of attitudes, norms, and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effects.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13(1), 264–276.
- Gabriel, S., Koefler, N., & Schneider, V. (2024). Creating a space for the sacred in a secular world: Shabbat dinners as a vehicle for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social connection, and meaning. *Studies in Religion/Sciences Religieuses*, 53(4), 577–592.
- Gabriel, S., Naidu, E., Paravati, E., Morrison, C. D., & Gainey, K. (2020). Creating the sacred from the profane: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and everyday activities.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15(1), 129–154.
- Gabriel, S., Valenti, J., Naragon-Gainey, K., & Young, A. F. (2017). The psychological importance of collective assembly: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Tendency for Effervescent Assembly Measure (TEAM).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29(11), 1349–1362.
- Haidt, J., Seder, J. P., & Kesebir, S. (2010). Hive psychology, happiness, and public policy. In A. P. Eric & R. S. Cass (Eds.), *Law and happiness* (pp. 133–156).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opkins, N., Reicher, S. D., Khan, S. S., Tewari, S., Srinivasan, N., & Stevenson, C. (2016). Explaining effervescence: Investig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hared social identity and positive experience in crowds. *Cognition and Emotion*, 30(1), 20–32.
- Kettner, H., Rosas, F. E., Timmermann, C., Kärtner, L., Carhart-Harris, R. L., & Roseman, L. (2021). Psychedelic communitas: Intersubjective experience during psychedelic group sessions predicts enduring changes i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social connectedness. *Frontiers in Pharmacology*, 12, 623985.
- Khan, S. S., Hopkins, N., Reicher, S., Tewari, S., Srinivasan, N., & Stevenson, C. (2016). How collective participation impacts social identity: A longitudinal study from India. *Political Psychology*, 37(3), 309–325.
- Liebst, L. S., Philpot, R., Bernasco, W., Dausel, K. L., Ejbye-Ernst, P., Nicolaisen, M. H., & Lindegaard, M. R. (2019). Social relations and presence of others predict bystander intervention: Evidence from violent incidents captured on CCTV. *Aggress Behavior*, 45(6), 598–609.
- Marsh, K. L., Richardson, M. J., & Schmidt, R. C. (2009). Social connection through joint action and interpersonal coordination. *Topics in Cognitive Science*, 1(2), 320–339.
- Moscovici, S. (1993). *The invention of society: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s of social phenomena*. Polity Press.
- Naidu, E., Gabriel, S., Wildschut, T., & Sedikides, C. (2024). Reliving the good old days: Nostalgia increase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through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15(1), 22–32.
- Neville, F., & Reicher, S. (2011). The experience of collective participation: Shared identity, relatedness and emotionality. *Contemporary Social Science*, 6(3), 377–396.
- Pace, M., & Bilgic, A. (2018). Trauma, emotions, and memory in world politics: The case of the European Union's foreign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conflict. *Political Psychology*, 39(3), 503–517.
- Páez, D., Rimé, B., Basabe, N., Włodarczyk, A., & Zumeta, L. (2015). Psychosocial effects of perceived emotional synchrony in collective gathering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8(5), 711–729.
- Pelletier, P. (2018). The pivotal role of perceived emotional synchrony in the context of terrorism: Challenges and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March 2016 attack in Belgium.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48(9), 477–487.
- Pizarro, J. J., Cusi, O., Alfaro, L., Burboa, A., Vera Calzaretta, A., Carrera, P., & Páez, D. (2019). Asombro maravillado, temor admirativo o respeto sobrecogido: Revisión teórica y Validación de una Escala de Asombro en Castellano. *Revista Latinoamericana de Psicología Positiva*, 4, 37–56.
- Pizarro, J. J., Zumeta, L. N., Bouchat, P., Włodarczyk, A., Rimé, B., Basabe, N., Alberto, A., & Páez, D. (2022). Emotional processes, collective behavior, and social movements: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outcomes during collective gatherings and demonstration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3, 974683.
- Renning, M., & Göritz, A. (2016). Prosocial consequences of interpersonal synchrony: A meta-analysis. *Zeitschrift für Psychologie*, 224(3), 168–189.
- Rimé, B., Bouchat, P., Paquot, L., & Giglio, L. (2020). Intrapersonal, interpersonal, and social outcomes of the social sharing of emotion.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31, 127–134.
- Rimé, B., & Páez, D. (2023). Why we gather: A new look, empirically documented, at emile Durkheim's theory of collective assemblies and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8(6), 1306–1330.
- Stellar, J. E., Gordon, A. M., Piff, P. K., Cordaro, D., Anderson, C. L., Bai, Y., Maruskin, L. A., & Keltner, D. (2017). Self-transcendent emotions and their social functions: Compassion, gratitude, and awe bind us to others through prosociality. *Emotion Review*, 9(3), 200–207.
- Stott, C., Ball, R., Drury, J., Neville, F., Reicher, S., Boardman, A., & Choudhury, S. (2018). The evolving normative dimensions of 'riot': Towards an elaborated social identity explan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8(6), 834–849.
- Swann, W. B., Jetten, J., Gómez, A., Whitehouse, H., & Bastian, B. (2012). When group membership gets personal: A theory of identity fus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119(3), 441–456.
- Twenge, J. M., Sherman, R. A., Exline, J. J., & Grubbs, J. B. (2016). Declines in American adults' religious participation and beliefs, 1972–2014. *Sage Open*, 6(1), 2158244016638133.
- Van Cappellen, P. (2014). *Positive emotions and self-transcendence*. In V. Saroglou (Ed.), *Relig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behavior* (pp. 123–145). Psychology Press.

- Vilanova, F., Beria, F. M., Costa, Â. B., Koller, S. H., & Hackett, J. (2017). Deindividuation: From Le Bon to the 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deindividuation effects. *Cogent Psychology*, 4(1), 1308104.
- Włodarczyk, A., Zumeta, L., Basabe, N., Rimé, B., & Páez, D. (2023). Religious and secular collective gatherings, perceived emotional synchrony and self-transcendent emotions: Two longitudinal studies. *Current Psychology*, 42(6), 4754–4771.
- Włodarczyk, A., Zumeta, L., Pizarro, J. J., Bouchat, P., Hatibovic, F., Basabe, N., & Rimé, B. (2020). Perceived emotional synchrony in collective gatherings: Validation of a short scale and proposition of an integrative measur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1, 1721.
- Yang, Y., & Land, K. C. (2008). Age-period-cohort analysis of repeated cross-section surveys: Fixed or random effects?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36(3), 297–326.
- Zabala, J., Conejero, S., Pascual, A., Zumeta, L. N., Pizarro, J. J., & Alonso-Arbiol, I. (2023). Korrika, running in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through the Basque Country: A model of collective processes and their positive psychological effect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4, 1095763.
- Zabala, J., Vázquez, A., Conejero, S., & Pascual, A. (2024). Exploring the origins of identity fusion: Shared emotional experience activates fusion with the group over tim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63(3), 1479–1496.
- Zickfeld, J. A. O., Schubert, T. A. O., Seibt, B. A. O., Blomster, J. A. O., Arriaga, P. A. O., Basabe, N., & Fiske, A. P. (2019). Kama muta: Conceptualizing and measuring the experience often labelled being moved across 19 nations and 15 languages. *Emotion (Washington, D.C.)*, 19(3), 402–424.
- Zlobina, A., & Dávila, M. C. (2022). Preventive behaviours during the pandemic: The role of collective rituals, emotional synchrony, social norms and moral obligatio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61(4), 1332–1350.
- Zumeta, L. N., Castro-Abril, P., Méndez, L., Pizarro, J. J., Włodarczyk, A., Basabe, N., & Pinto, I. R. (2020).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self-transcendence,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social well-being during 8 march demonstration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1, 607538.
- Zumeta, L. N., Oriol, X., Telletxea, S., Amutio, A., & Basabe, N. (2016). Collective efficacy in sports and physical activities: Perceived emotional synchrony and shared flow.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6, 1960.

# From Collective Ritual to Secular Gathering: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and its Psychosocial Effects from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Xue Qiu, Guan Jian*

( Department of Social Psychology, School of Sociolog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

**Abstract**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originally originated from collective religious rituals. Durkheim coined the term to describe the emotional effects generated by collective rituals.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is now regarded as a "solidarity adhesive" commonly found in secular gatherings, and it is a cross-cultural social phenomen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changes, religious collective rituals were mainly prevalent in traditional societies, while secular gatherings are mainly popular in the current modern society. Therefore,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worldwide has also undergone a transformation from religious rituals to secular gatherings: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in secular gatherings is more common, while that in religious rituals is gradually declining. Exploring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s of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and its psychosocial effects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but also an important topic for the innov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o maintain individual mental health. This article first differentiates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Then, combining with relevant theories, it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psychosocial effects of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from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and its explanatory mechanisms. Finally, it expounds on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From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in secular gatherings is different from that in religious collective rituals. To some extent, the connotation, generating conditions, and research methods of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in secular gatherings have changed. From the early collective rituals to the current secular gatherings, the connotation of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has undergone two changes in meaning. The first is the process of desacralization (i.e., secularization), and the second is the process of deritu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gnition, emotion, and behavior, shared attention, shared emotions, and coordinated actions are the basis for activating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Early scholars explored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using more traditional sociological research methods, while current psychological research mostly uses time-series designs to explore the persistent impact of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over time.

A large number of current psychological verification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can trigger a series of psychosocial effects. For example,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can enhance collective identity, social cohesion, positive emotions, and well-being. Based on Durkheim's theory of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researchers have developed new theories to explain and study the psychosocial effects of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can play a role in protecting the mental health of individuals and groups in aspects, such as enhancing cohesion and promoting mental well-being.

In addition, the psychosocial effects of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are not limited to short-term impacts, and it has a cross-temporal persistence. Even after the effect of inducing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on participants in an experimental situation ends, they still benefit from the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effect. The positive impact of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can last for at least 1 to 4 weeks, and in some cases, it can last up to 10 weeks or even 8 months. The persistence of the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effect is the key to maintaining positive psychosocial effects.

Future research needs to explore the negative impacts of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While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is an essential bond for maintaining morality and order, it can also trigger large-scale group incidents. Given the complexity of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in future research, scholars can pay more attention to its negative impacts. In addition, online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may have a dual impact. We need to give full play to its cohesive function while preventing the possible chaos in the order of the online society. The form of participation in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has changed from offline to online. What ar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nature and impacts between these two forms? Future research needs to further reveal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impacts of online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and its mechanisms from a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and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offline and online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Future research also needs to further examine the explanatory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persistent impact of the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effect. The psychosocial effects of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may have a persistent impact through the mechanism of collective memory in the temporal dimension.

**Key words**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collective gathering, group cohesion, mental health